

## 「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 與臺灣經濟長期表現

林向愷

2015 年，我國出口連續六個月衰退，經濟成長率面臨「保二」危機。出口衰退有二大原因：中國經濟成長減緩以及中國產業供應鏈在地化。2000 年起，中國已逐步降低自國外進口零組件，改由國內生產供應，其出口商品中內含進口零組件已降為 35%，顯示中國經濟發展策略已逐漸由進口替代接續。

六〇年代，臺灣以「出口導向」策略發展經濟，雖未完全忽視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但臺灣「經濟奇蹟」背後已出現對外國技術與市場雙重依賴的危機，其脆弱性在中國崛起過程中逐漸暴露。2008 年後，政府忽視此種危機仍全盤接受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觀點強調「貿易自由化」的重要性，忽略發展自主技術與建立關鍵零組件以及重要原物料等進口替代產業的必要性，造成臺灣國內投資率持續低迷，出口與經濟成長動能減弱。

政府一再誇稱的「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雖讓 2000 年後臺灣出口因提供在中國生產的臺商所需的中間財與機器設備而維持一定榮景，但依賴海外生產的經濟

轉型策略，讓企業主與中高階層科技管理人才成為贏者圈成員，臺灣社會其他成員淪入輸者圈，造成所得分配持續惡化，失業率居高不下，勞工實質薪資倒退十五年。本文將說明這些經濟表現與「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間的關聯性。

### 壹、「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 是臺灣出口成長動能不足的主因

圖 1 顯示：臺灣在 1980-1990、1990-2000 與 2000-2010 年三個期間的十年平均出口年成長率分別是 23.8%、12.6% 與 8.8%，同期間南韓的十年平均出口年成長率分別是 23.5%、17.1% 與 17.0%，呈現我國出口動能逐漸減弱的趨勢。同樣歷經九〇年代全球化與中國崛起，臺、韓兩國出口金額從 1990 年約略相當，到目前臺灣出口金額不到南韓的六成。臺灣出口成長動能不足係因 2000 年後政府放任廠商採「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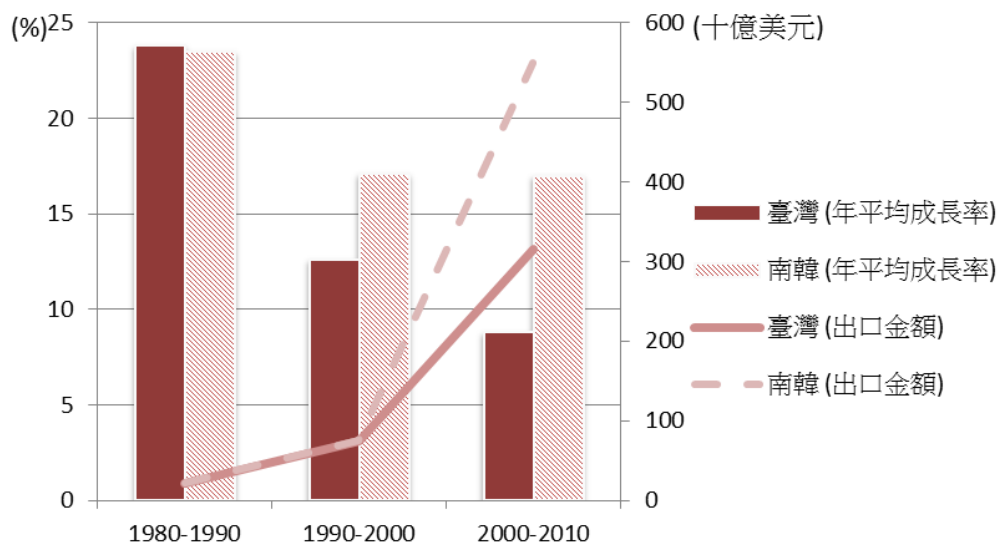


圖 1 1980-2010 年間臺灣與南韓出口趨勢比較

資料來源：吳啟禎、林向愷、柳嘉峰（2015）

Krueger（1997）指出：長久以來，經濟學界普遍認知到貿易政策（trade policy）與經濟發展間存有重要關連，但何種貿易政策是促進經濟發展最有效的工具則意見分歧。五〇與六〇年代，經濟學界共識是貿易政策的設計與制定需以如何推動「進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策略為思考基礎，因為發展進口替代產業就等同於工業化，而工業化有助於經濟發展。到了七〇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使得主流的貿易政策由「進口替代」轉變為「出口導向」（export-led）為主軸，但仍強調進口替代策略的重要性，因為「出口導向」策略雖可促進出口擴張，一旦既有的比較利益逐漸消失後，須配合「進口替代」策略讓進口減少，提升生產的附加價值，出口才能對經濟成長灌注更多動能。

九〇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更進一步主張貿易自由化才是經濟發展成功最關鍵的政策。世界銀行甚至要求開發中國家政府改採貿易自由化做為財經改革的一環。

面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觀點，Rodrik（1999）提出以下不同的論點：

- 1.貿易自由化不是創造持續經濟成長（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一個可靠的機制。
- 2.貿易自由化會擴大國內個人與家庭所得、財富的差距。
- 3.貿易自由化會讓一國經濟體系更易受到國際因素的衝擊而影響到社會正常運作。

他並認為，以「進口替代」策略做為經濟發展的工具，歷史上並非沒有成功的

例子。然而，新自由主義學者為污名化「進口替代」策略，常誇大發展進口替代產業的代價。

實際上，六〇、七〇年代臺灣與南韓政府並非完全依賴「出口導向」策略，由於透過商品出口無法發展不具比較利益的產業，兩國政府嘗試背離比較利益原則，發展不具比較利益的進口替代產業，且政府亦未完全放任市場機制發展經濟，政府介入與干預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研究東亞經濟學者 Wade（1990）就認為 90 年代以前，創造臺灣經濟奇蹟係因臺灣政府懂得「管理市場」（governing the market）。Rodrik（2011）則指出，南韓於轉型時期，政府便積極培育「背離」比較利益的產業。Amsden（1989）亦強調南韓政府懂得「智鬥」市場機制（getting the prices wrong）。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南韓採取「占領國內市場，提升產品競爭力，再進軍國際市場」的經濟轉型策略，才是臺韓兩國出口表現出現差異原因所在。因此，忽視「進口替代」策略將讓新的產業、組織以及技術很難產生致使熊彼得創造性破壞過程（creative destruction process）的經濟發展機制易出現斷層缺口，而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只能透過專注於專業化生產為經濟成長添加動能。

六〇年代臺灣以「出口導向」做為經濟發展策略時，市場與價格成為資源配置重要的機制，廠商將資源投入具有比較利益的商品生產（例如：六〇、七〇年代的勞力密集商品），這些商品的出口成為經濟成長動力。廠商為生產更多的出口商品常

以較高的薪資吸引勞工到工廠工作。當時政府雖用國家力量抑制生產要素報酬的成長，但薪資仍與經濟成長同步成長。

八〇年代，出口仍以勞力密集產品為主，資本與技術密集商品出口只占製造業出口一半，顯示臺灣進口替代策略成效有限。民主轉型期間（1987-1992）長期被威權體制壓制的各種社會運動（如：工運與環保運動）紛紛興起，廠商生產成本增加（見圖 3，1987-1992 期間臺灣薪資成長率），加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設置經濟特區，積極招引臺商前往投資，形成第一波產業外移。這些處於產業下游的廠商外移中國後，複製臺灣的成功經驗，繼續在中國採取壓低成本的經營模式利用原有技術以更大規模從事原商品的生產與出口。

九〇年代政府對廠商投資中國採取「戒急用忍」的管制政策，2000 年前，廠商投資中國金額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維持在 0.5% 上下，而國內投資率（國內投資金額占 GDP 比率）則維持 25% 以上。2000 年後，民進黨政府無論採取「積極開放」或「有效開放」政策，臺商投資中國占 GDP 比重皆呈快速上升趨勢，2008 年已接近 2.5%，其中 2002 年 4 月行政部門大幅放寬廠商投資中國限制，工業產品開放投資比率高達 98.58%，高科技產業尚未開放項目只剩下 TFT-LCD 液晶顯示器前中段面板製程，IC 設計與製造（八吋以下晶圓代工已有條件開放）以及封裝測試。2008 年後，政府又放寬廠商投資中國上限並開放 12 吋晶圓廠赴中國投資。2008 至 2014 年間，投資中國比重一度高達

2.7%。

2000 年後，投資中國的產業已由紡織、塑橡膠等勞力密集產業轉為電子及電器產品、基本金屬、機器設備製造業、以及石化業，且廠商平均投資規模愈來愈大。這些投資中國的廠商基於經營策略的考量，以及企業本身人力與資金的限制，其海外投資金額與國內投資金額存在排擠關係。依經濟學者 Feldstein（1994）跨國實證研究顯示，廠商海外投資金額幾乎一對一完全排擠其國內投資金額。圖 2 亦清楚顯示：1991-2013 年間，隨著臺商投資中國比重持續上升，國內投資率則呈下降趨勢，2013 年已不到 22% 且遠遠落後南韓。

「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其實是延續六〇、七〇年代臺灣以降低成本為生產模式的「出口導向」策略，結合海外生產的廠商所形成的兩岸分工模式。海外生產勢必開放海外投資，赴後進國家生產對採取「降低成本」生產模式的廠商有利。若多數廠商採取這種策略，國內投資就會被海外投資排擠而無法提升，新工作機會的創造也會受到影響。這些廠商投資中國的負面效果原應由政府加以防範，但政府卻誇稱「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是臺灣經濟發展成功模式，忽略臺灣經貿過度集中

於中國，臺灣工業基地縮小、產業鏈遭受破壞以及產業結構過度集中於高耗能與高污染等少數產業等問題。

產業發展過程中，決定產業競爭力一個重要因素是廠商因聚集在地理距離相近的位置，產生廠商相互支援，資訊相互流通，以及工作人員相互學習的群聚效果。臺灣資訊科技業就是因為相關產業齊備而具有強大的產業競爭力。若只有少數且有必要的廠商外移，外移對產業群聚效應不至於造成嚴重影響，一旦多數廠商外移則會破壞臺灣產業結構的完整性，造成許多原本不必赴中國投資的廠商著眼於臺商在中國所形成的完整生產體系而被迫移往中國。近年來，廠商大量投資中國已破壞國內產業結構使得產業群聚效應變小，進而影響到產業的整體競爭力。

政府在回應九〇年代轉型挑戰時，未能積極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以填補產業外移後，產業空洞化現象，導致破壞性創造變成毀滅性破壞過程，過分依靠市場機制在經濟轉型所扮演的角色，使得臺灣經濟原有的弱點更為明顯。新自由主義者卻認為這是經濟規律自然的結果，將出口與經濟成長動能減弱歸因於臺灣貿易自由化程度不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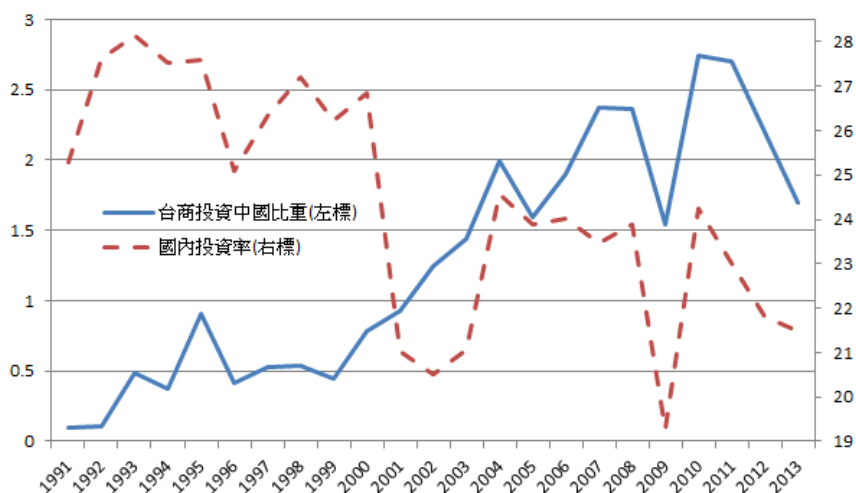


圖 2 投資中國取代投資臺灣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與行政院陸委會

## 貳、「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導致臺灣技術優勢不再

Michael Porter 教授在 1989 年出版有關國家競爭力一書認為「降低成本」策略等同於同質化競爭 (competitive conver-

gence) 策略，而採取「創造價值」策略的廠商由於重視商品差異化程度以及市場區隔的行銷策略，生產成本就不會成為商品競爭力唯一決定因素。Michael Porter 教授指出日本企業過份重視「降低成本」策略是日本經濟在九〇年代衰退的重要因素。

表 1 亞洲主要國家商品在美國市場與中國商品差異度

	1990	1995	2000	2003
日本	96.8	91.5	83.8	78.1
南韓	75.2	71.6	62.7	59.1
臺灣	72.5	59.8	50.5	31.2
新加坡	85.3	80.8	65.2	59.9
印尼	51.5	40.3	32.0	33.2
馬來西亞	62.6	63.2	52.7	35.0
菲律賓	58.1	54.4	54.1	39.3
泰國	63.6	52.5	44.3	30.2

資料來源：Economist, 26 March, 2005

表 1 呈現：臺灣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與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間差異度，隨著多數臺灣廠商維持既有的「降低成本」生產模式到中國投資與生產而縮小。舉例說，1990 年臺灣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與中國出口的商品間差異度為 72.5（100 表示兩國商品具有完全的差異性，屬於不同商品），與同年度南韓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與中國出口商品差異度 75.2 相近。其後，南韓廠商較多採取「創造價值」策略且投資中國的比重遠較臺灣為低（見表 2），到了 2003 年南韓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與中國出口的商品的差異度仍高達 59.1，而臺灣與中國出

口到美國的商品的差異度只剩下 31.2。廠商到中國投資以原技術、生產原產品，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在世界主要市場取代臺灣出口商品；另一方面，在海外生產的廠商延續原在臺灣的「降低成本」生產模式，固然減輕廠商升級的壓力，但臺灣產業技術優勢因欠缺研發愈來愈難維持。據經濟部統計資料顯示 2013 年外銷訂單中，國內生產比重已降至 47.4%，而中國生產比重卻上升到 47.1%，呈現我消彼長的現象。同時，海外生產的廠商，向臺灣採購零組件與半成品家數僅佔 38.6%。（註 1）

表 2 臺日韓三國對中國投資占其對外投資比率

年次	臺灣	南韓	日本
2000	33.93%	12.22%	2.04%
2001	38.80%	11.29%	4.64%
2002	53.38%	24.55%	4.88%
2003	53.66%	33.22%	8.59%
2004	67.24%	38.37%	12.96%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這些外移廠商與國內中上游產業間存在的供應鏈，短期內形成兩岸分工新模式：位居全球價值鏈附加價值最低的下游廠商外移中國後，由臺灣進口生產所需的原物料、關鍵零組件與機器設備，加工與組裝再出口到歐美日主要市場，新模式下，臺商投資中國帶動臺灣機器設備、原物料以及半成品對中國的出口。海外生產比重提高後，短期內此種「投資帶動出口」的市場力量將原來以出口勞力密集商品為

主，改以出口資本、技術密集中間財為主的產業結構。新模式讓人誤以為臺灣產業已藉此轉型升級。

此種兩岸分工新模式雖讓臺灣成為中間財出口基地，然而欠缺「進口替代」策略深化，這些中間財產業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偏低，致使產業結構逐漸集中在少數資本密集度高的中間財產業。新自由主義卻視此為個別廠商依據比較利益原則、朝向專業化生產的典範，並認為此種專業化生

產可提升經濟效率，為經濟成長添加動能。

新自由主義更提出透過市場機制就可讓經濟自動演變達到轉型升級的效果，強調任一時點的比較利益係反映該時點的市場價格為計算基礎的資源配置，因為廠商只要依據價格決定生產何種產品，資源配置的變化就反映經濟轉型。Stiglitz（2001）認為：在資訊不對稱以及市場機制失靈情形下，政府應干預市場，以及改善資源配置效率。Rodrik（2011）亦指出：只有當市場價格能夠真實反映比較利益時，比較利益對企業決策才有實際意義。因此，忽略外部性以及資訊不對稱，讓「市場機制、自動演變」的經濟發展機制所產生的資源配置不符合效率原則。未來臺灣經濟若繼續將資源依市場與價格機制集中在少數產業，強調國際分工與專業化生產的重要性，未來臺灣經貿自主程度將逐步下降。在此結構下，要想從少數既存產業當中，衍生出新興產業，更新經濟成長動能，如同緣木求魚。

長期以來，政府以「臺灣接單、海外生產」做為經濟發展模式，短期內雖讓臺灣出口成長率維持一定水準，但海外生產的臺商所創造龐大中間財與機器設備的需求，亦成為中國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以提升「出口導向」策略對經濟成長貢獻度的誘因。由於中國政府一向以補貼、政策融資、成立投資基金方式扶植產業，中國政府推動「進口替代」策略後，中國生產的原物料、半成品與機器設備將逐漸取代由臺灣出口的中間財與機器設備。然而，政府仍然接受新自由主義論點，認為政府不應扮

演主導的角色，將經濟轉型的工作交給市場與價格，政府由市場帶領者變為市場跟隨者，導致創造性破壞過程因斷裂而無法成為臺灣經濟成長持續動力。這也是 2015 年來連續六個月對中國出口衰退的原因。

### 參、「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與跨國勞動替代

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正處於先進國家與後進國家之間，不同的對外投資策略對技術優勢的維持以及工作機會的創造有不同的影響。第一種投資策略是投資中國或其他後進國家，將已不具價格競爭力低層次產業移往這些國家，結合當地低廉的土地與勞工，繼續原產品生產，以較低成本在國際市場從事價格競爭。生產外移固然對個別廠商有利，但會造成國內工作機會的減少，留在臺灣的中、低技術勞工還須與外勞一起競爭工作機會，導致薪資難漲且失業率上升。第二種投資策略是藉投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取得有助於新的或高層次產業發展所需的技術、行銷管道或新商品的生產。只要這些新的或高層次的產業競爭力夠強，引進產業數目夠多，規模夠大，這些產業所創造的工作機會可以彌補原低層次產業移往海外生產後在國內所減少的工作機會。兩者之間雖不可能完全替代，但透過適當的職訓，讓職業轉換難度變小，整體失業率不至上升太快。

就先進國家而言，其海外投資常是取得其他國家先進技術品牌與行銷管道的重要管道。先進國家海外投資意含著透過對

外投資取得技術移轉的機會，其促進技術跨國移轉的效果，遠大於透過商品出口的技術學習效果，這也是歐美日先進國家海外投資有七成以上集中在其他先進國家的原因。經濟發展早期，後進國家雖可利用「出口導向」策略快速累積技術學習效果；但進入中進國家行列後，由市場與價格依循比較利益原則，發展新技術，進入新產業，完成產業升級的可行性很低。此種藉市場機制所產生的技術學習效果對維持技術優勢與發展自主技術效果有限，必須依靠國內研發資源的投入與正確的海外投資策略。

由表 2 就可看出：步入中進國家行列的臺灣與先進國家海外投資的方向與策略正好相反，以「臺灣接單、海外生產」做為經濟發展模式，造成海外投資有七成以上集中在後進國家，且投資中國的比重遠遠超過發展程度更先進的日本或競爭對手南韓。由於臺灣海外投資重心在中國，加上先進國家對臺灣的實質投資也不高，工作機會的創造遠低於現有工作機會的流失，結果失業率會隨臺商投資中國比重升高而上升，經濟成長動能減弱。圖 3 顯示：臺灣年失業率由 1993 年以前介於 1%-2% 之間增加到 2000 年以後的 3%-5% 之間，顯示「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是失業率發生結構性上升的主要因素。

臺灣勞動薪資購買力倒退十五年，國

內學者向來根據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認為透過國際商品貿易，不同國家生產要素投入價格趨同是必然現象，但「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所形成廠商投資中國管道，無須透過國際商品貿易管道就可讓臺灣實質薪資率倒退。首先，資金與技術跨國移動障礙消除後，國內廠商自由前往中國從事更大規模的生產，資金與技術外移導致對中國勞工需求的增加，對臺灣國內勞工需求減少。縱使政府並未開放中國勞工來臺工作，但廠商將資金、技術移往中國，在中國雇用大量勞工，取代原在臺灣雇用勞工，讓廠商投資中國等同於廠商以「中國勞工取代臺灣勞工」的跨國勞動替代現象。強調生產要素移動速度不同跨國勞動替代的論點與傳統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強調生產要素不跨國移動的假設不同。（註 2）其次，「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下，廠商可將資金與技術自由外移亦讓勞動需求價格彈性變大，使得低技術勞工的薪資所得成長減緩，更讓勞動市場中的工作機會短期波動幅度變大。圖 4 清楚顯示：全球化下，政府放任廠商自由選擇生產地點，讓廠商多了出走（exit）選項是臺灣薪資所得成長緩慢甚至負成長的主因。因此，薪資所得購買力停滯將影響到我國的民間消費，致使未來經濟成長動能更依賴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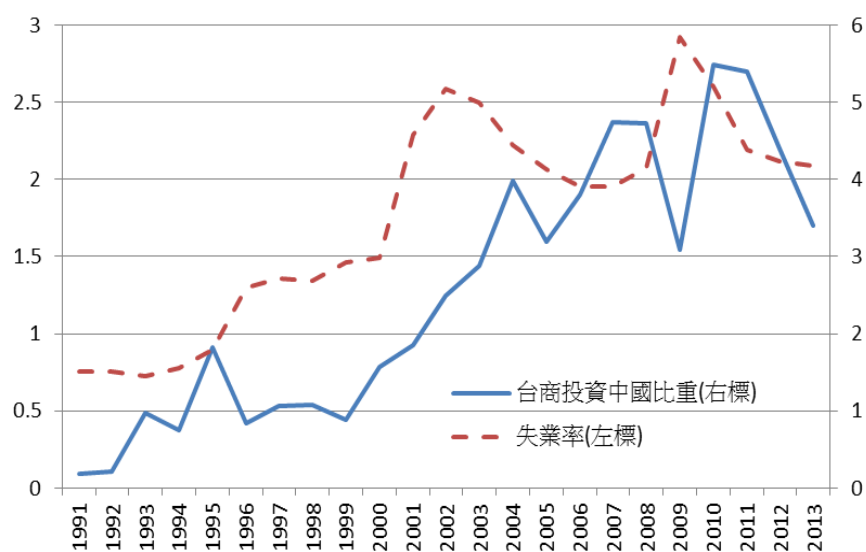


圖 3 投資中國比重與失業率趨勢關聯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與行政院陸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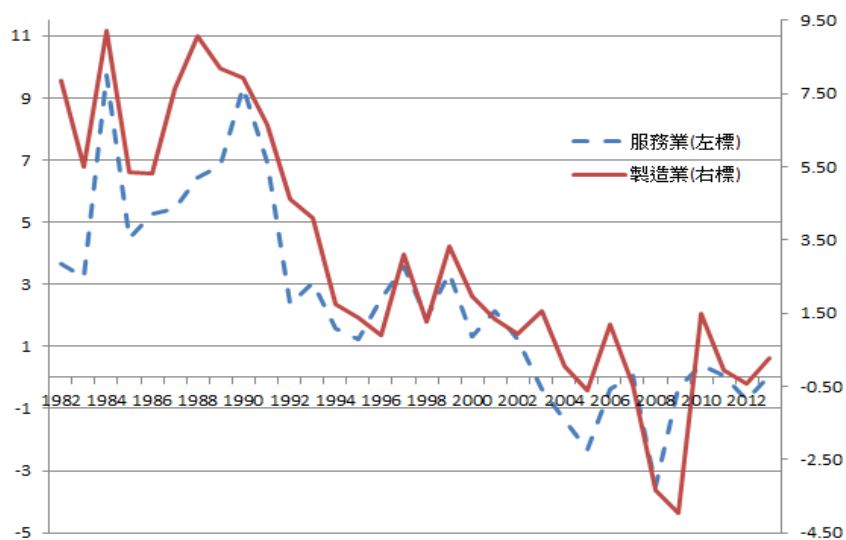


圖 4 民主轉型後薪資成長率呈現下滑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 肆、「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導致所得差距擴大

六〇至八〇年代前期，臺灣採取出口導向的策略，與其他亞洲四小龍成員搭上歐美先進國家貿易開放列車，以出口勞力密集商品為主，商品出口帶動經濟快速成長。為擴充生產規模以應歐美市場需求，廠商以較高的薪資吸引更多勞工投入。此時，出口成長帶動薪資所得成長，八〇年代中期，追求「降低成本」策略的臺灣廠商開始將生產外移至中國等後進國家，GDP 仍因機器設備與半成品、零組件等中間財的出口而有成長，但勞工薪資所得卻因廠商生產外移所產生的跨國勞動替代以及國內投資不振導致工作機會創造不夠快而呈現停滯狀態，這也是為什麼九〇年代以後，GDP 與薪資所得兩者不再出現同步成長。

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Krugman 教授認為，只要生產要素跨國移動速度不一致，全球化過程中不再只有贏者而無輸者；其中贏者圈有兩類成員，第一類成員是後進國家的勞動者，因為全球化過程中，先進及中進國家的資金及技術可以自由進入後進國家，這些後進國家勞動生產力因而大幅提升，移往這些國家生產的廠商因商品價格競爭力強，對當地的勞動需求跟著增加，帶動後進國家勞工薪資成長；第二類成員是先進、中進國家的企業主及中、高階管理與高科技人才，因為他們擁有的資本與技術因全球化得以更自由的跨國移動，追求更高的報酬；而所有不

是這兩類成員都是全球化的輸者圈。

2000 年後，薪資所得不再與 GDP 呈現同步成長讓不少臺灣家庭無法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由表 3 可清楚看到：這段期間所得最低的 20% 家庭其可支配所得呈現負成長（-0.17%），而所得次低的 20% 家庭平均年成長率亦只出現微幅成長（0.12%）；另一方面，第四分位組與第五分位組高所得家庭可分配所得成長則遠超過第一與第二分位組，導致五等分所得差距擴大。圖 5 顯示：五等分位組所得差距的倍數，由 1999 年的 6.5 倍一路上升到 2011 年的 7.8 倍。不同分位組家庭可支配所得成長呈現顯著差異的原因在於「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只對可以跨國移動的企業主以及中高階管理與高科技人才有利，對國內中低技術勞工，由於不可能要求他們隨廠商到海外工作，領取四分之一或更低薪資在臺灣養家活口。低國內投資率是中低技術勞工與年輕族群感受不到薪資成長遠景的原因。

由於第一分位組至第五分位組家庭可支配所得成長率遠低於每人平均 GDP 成長率，顯示五等分位組所得差距倍數不是觀察企業主與中、低技術勞工間所得差距最佳指標。依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所得稅申報資料進一步細分，發現臺灣所得最高 5% 與最低 5% 的倍數（即二十等分位組）由 1999 年 37.27 倍快速上升至 2013 年的 99.39 倍，顯示「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使得臺灣貧富不均程度日益明顯（見圖 6）。

表 3 基層民眾看得到但吃不到經濟成長果實

Year	第一分位組	第二分位組	第三分位組	第四分位組	第五分位組	總平均	GDP per capita
2000	-0.58	-0.44	0.01	1.14	0.25	0.27	4.63
2001	-12.05	-8.51	-5.07	-2.92	2.09	-2.59	-2.55
2002	4.45	2.6	0.52	-0.81	0.79	0.83	4.57
2003	1.42	1.27	0.18	1.58	0.01	0.65	2.22
2004	0.34	1.81	4.01	1.42	-0.46	1.08	5.84
2005	0.13	0.12	0.43	0.69	0.28	0.37	3.42
2006	2.19	1.56	2.1	2.87	1.68	2.05	4.11
2007	2.55	1.1	0.5	-0.34	2.13	1.17	5.63
2008	-2.8	-1.09	-0.4	-0.1	-1.72	-1.11	-2.25
2009	-7.26	-3.67	-3.15	-1.85	-2.46	-2.9	-1.78
2010	2.21	-0.33	0.25	0.52	-0.17	0.2	8.64
2011	2.67	0.76	1.65	2.65	2.22	2.07	1.14
2012	1.68	3.58	2.98	0.97	1.02	1.7	2.28
2013	2.65	2.86	1.7	1.64	1.96	1.99	3.31
平均	-0.17	0.12	0.41	0.53	0.54	0.41	2.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戶收支調查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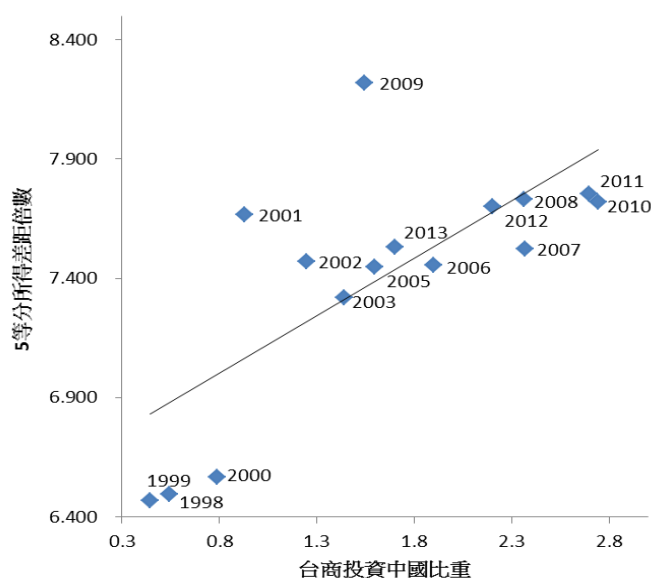


圖 5 投資中國比重與所得差距統計關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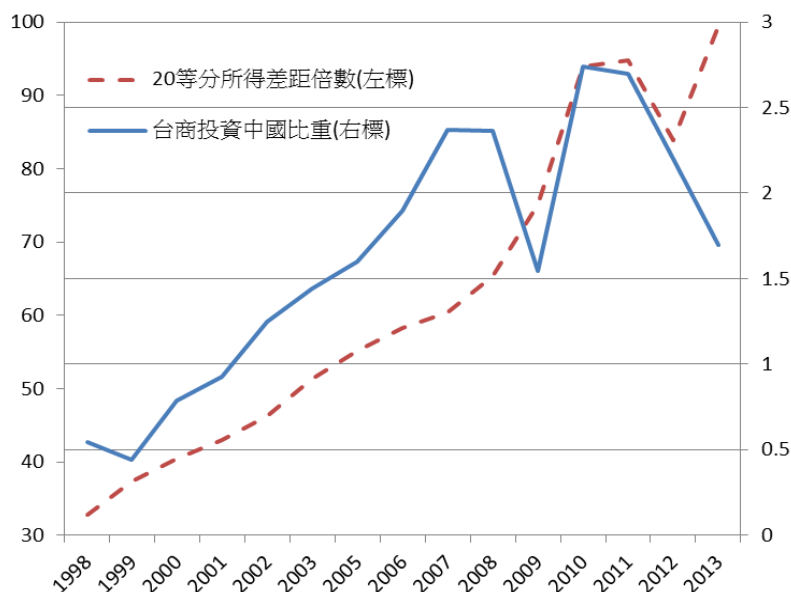


圖 6 投資中國比重與所得差距趨勢關連圖

家庭所得差距愈大的社會愈易助長人民對社會的不滿，社會不滿對投資意願的影響主要透過以下二個管道：首先，大規模抗議、罷工與示威會阻礙正常生產活動，進而影響資本邊際生產力。一旦廠商預期未來資本邊際生產力會因此受到影響，廠商的投資意願就會下降。其次，社會不安定會讓投資、經營環境不確定程度提高，造成廠商不願意留在國內投資或將工廠遷往國外。社會不滿程度達到一定水準，政府勢必改變現有政策予以回應。改變後的政策若過份強調所得重分配功能，將侵害人民財產權，對民間投資亦有不利的影響，民間投資減少就會影響資本累積的速度進而影響到經濟成長。同時，所得差距愈大的社會，愈鼓勵低所得的個人或家戶訴諸於較激烈的方式以改變社會現

況。

由此可知，若不解決中低所得的個人與家庭經濟地位持續弱化的問題，則會激化階層對立，底層人民爲了要翻身就會想顛覆現有體制，底層人民由於民主制度無法捍衛她們最起碼的公平正義或參與機會的均等，開始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底層民眾基本生活無法受到國家保障，正凸顯「臺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模式已背離臺灣的主體性。

## 伍、結語

除資金與技術跨國移動的政治障礙幾已移除外，一國商品市場的規模大小不再由該國領土疆域所界定。然而，全球化並不因此讓大多數國民可以自由選擇國家。

全球化下，商品、資金與技術可以跨國移動，資源配置更有效率讓現代經濟活動更繁榮。商品及部份生產要素無障礙的跨國移動，對這些資源擁有者而言全球化是機會，對未擁有者則須承擔全球化的代價。

我國憲法第十五條有人民的生存權應予保障的規定，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如何才能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權？它必須符合「臺灣主體性」原則，何謂「臺灣主體性」？就是任何公共政策必須關注到最基層人民的生活幸福，因為基層人民是全球化受害者，政府應以捍衛臺灣主體性做為一切施政的終極目標，它與國內政治穩定、經濟表現以及社會和諧密不可分，而明確的國家認同、持續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公平正義都有助於強化國內社會穩定，進而確保國家的生存與發展。

全球化固然對經濟發展有積極促進作用，但全球化亦因各國資源運用日趨專業分工以及資金、技術快速跨國移動而帶來更大的風險。全球化下，為減輕外在政經因素對國內經濟體系的衝擊，經貿自主成為維持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必要。經貿自主

決定於自主技術的優越性以及糧食與能源的自給程度。由於政府採取「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做為經濟發展策略，已造成臺灣欠缺堅實的自主技術與創新能力。新自由主義只強調國際分工的好處，對於利益如何分配則避而不談，隱含了只要優勢者進行恩惠施捨就可解決問題的天真想法。

面對當前臺灣經濟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我們必須嚴肅思考李前總統所揭示的「只有深刻了解臺灣左右問題嚴肅性的人，才能體會凝聚臺灣主體意識的力量源自於最基層人民的幸福生活。只有擺脫右傾資本主義思維，才能扭轉臺灣經濟戰略，發展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的永續經濟，也唯有如此，人民才有幸福可言，對臺灣也才有生命共同體的歸屬感。」（註4）

（本文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專案計劃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關鍵詞：**「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出口、海外投資、失業率、所得差距

## 註釋

註1：請見2015年7月1日《自由時報》報導。

註2：朱敬一、康廷嶽（2015）亦認為要素均等化理論不能用來解釋臺灣薪資不漲的現象。

註3：生產要素跨國移動速度不一致會產生輸者圈的原因可用以下比喻來看。國小運動會都有的兩人三腳競走的比賽項目，若把三腳視為三種生產要素：土地、勞工以及資本。只要三隻腳移動速度相同或原地不動，兩人不會因三腳競走而跌倒受傷：由這個例子就很清楚知道三種生產要素移動速度不一致就會產生輸者圈。

註 4：請見李前總統在「挑戰 2008，邁向正常國會」論壇演講稿。

## 參考文獻

- 朱敬一、康廷嶽，2015，〈經濟轉型中的「社會不公平」〉，《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1-22，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 吳啓禎、林向愷、柳嘉峰，2015，〈沒有經貿自主，就沒有國家主權：自由市場經濟教條與威權遺緒共同形塑臺灣經濟困境〉，收錄於《從當代問題探討臺灣主體性的建立》，臺灣教授協會。
- Alice H. Amsden,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Feldstein, 1994, The Effects of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Capital Stock. NBER Working Paper No. 4668. Cambridge, Mass.
- Anne Krueger, 1997,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We Lear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1), 1-22.
- Michal Porter, 1989,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 Dani Rodrik, 1994,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Product Quality: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n and Taiwan Exports," in *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 195-21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ni Rodrik, 1995, "Getting Interventions Rights: How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rew Rich?" *Economic Policy*, 55-107.
- Dani Rodrik, 1999, *Making Openness Work: 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 C.: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 Dani Rodrik, 2011, "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L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27-229.
- Joseph E. Stiglitz, 2001, "Foreword to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 Polanyi", New York, NY: Beacon Press.
- Robert Wade,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